

嶺東門戶

從古揚陽到近代潮汕

郭偉川／著



中華書局

自序

我居港忽忽已四十五載。時間有如電閃星馳，快得令人難以置信！但時序無聲，歲月留痕，如今已是兩鬢染霜，頭頂空疏，風吹涼涼。看來人生旅途，似乎到了登樂遊原看風景的時候了。¹當然，我並非多愁善感的人，不會見落葉而悲秋，聞杜宇而涕下。自思人生至此，仍對讀書和寫作保持濃厚的興趣，猶能挑燈夜讀，日日筆耕，已感幸殊深。而足慰平生者，莫若與學術結下不解緣，使我在漫長的歲月中，精神世界有所依傍。尤其退居之後，更能從容治學，博涉群經史籍，為中華文化上下求索，尚有新作陸續面世，為國學與鄉邦文化略盡綿薄。因此，內心感到坦然而充實。

近期，繼《南陽集》《嶺南古史與潮汕歷史文化》等書之後，拙撰《嶺東門戶：從古揭陽到近代潮汕》一書也即將出版。此際坐在桌前，夜闌聲寂，面對書稿，真是思緒萬千。於是動筆在書前寫了些內心告白；同時也為相關篇什勾勒提要，作為本書的導讀。

我從小酷嗜文史，20 世紀 70 年代後期，已有談詩辨史一類的文章見諸內地刊物。1980 年至香港定居，其後輾轉從事文化工作，因編輯《國際潮訊》的關係，開始接觸鄉邦文化。所以，在治學途徑上，像先師選堂先生一樣，我也是從潮汕地方史入手的。由於唐代大儒、一代文宗韓愈曾過化吾邦，因此研究潮學勢必涉及韓學，我研韓的文章前後有六七篇之多。於是由韓學而孔學，逐步由地方史而國史，成為我在 20 世紀八九十年代學術研究的主要內容。拙撰首本著作《南陽集》的出版，就是這一時期文章的結集。其後，香港容齋出版社聘我擔任總編輯，於是有更多時間做國學方面的研究。

自 20 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隨着我對國學研究的逐漸深入，學術視野

日益拓寬，逐步深入研究儒家《十三經》《二十五史》乃至《百子全書》等經史典籍及諸子百家的學說。而對上古史與經學的探索，其後便成為我主要的研究方向。尤其追隨選堂先生問學之後，更令我的學術眼界大開，加深了對禮學的探研，同時對民族學、歷史地理學和考古文化也產生濃厚的興趣，其後這些相關研究也運用到我的學術考證之中。而在考論經、史、子、集及出土文獻方面，我認為既要博採廣納，又須有重點；要善用積學，觸類旁通，在發現問題時，運用多學科融會貫通及相參互證努力加以解決。以拙著《〈周禮〉制度淵源與成書年代新考》一書為例，內中引用幾及《十三經》中之十經，以及大量傳世經典史籍和出土文獻的相關史料。當然，這樣做需要花費大量的心血和考證工夫。所以，過去數十年，國學研究和歷史考證確實佔去我大部分的時間。

記得一位留過洋而國學修養甚佳、且對學術界頗為了解的朋友曾對我說：

「你既不在大學或研究機構工作，不必為學位和評職稱而忙於寫論文和出書。但你多年來卻甘坐冷板凳，花大量時間和心血做研究，著作出了一本又一本。許多人認為，以你的學術水準以及在國學方面的成就而言，足以與當今中國學術界第一流的學者比肩而毫不遜色。別的不說，你在兩周史、禮學以及歷史考證等學術領域，都有獨特貢獻，很有影響。北大吳飛教授在《禮學與歷史研究》一書的序文中對你的學術成果的評述，就說得極為精闢中肯，見解獨到，很有水平。不過，我還要補充一點看法：自清代以來，傳統學術崇尚義理、考據、辭章，三者各有所專，而以能融會貫通為貴。可惜現今能達此境界的學人已不多，因為要達標絕不容易：一是要對儒家經學義理有深入研究，並有著作加以系統的闡發；二是對國史上存在的重要學術問題，能用紙上傳統文獻結合出土文獻加以考證，且著作有獨創性和影響力；三是有深厚的古典詩文修養，能寫一手有氣派有深度且為一般文人學者難以企及的好文章。然而環顧當今海內外，能將此三者熔於一爐的學者，屈指可數。平心而論，你應該算一個。實際上，現在你在相關學術領域已很出名。可惜才學未盡大用，且多年來付出多而所得少，大家都代你不值！但你仍如此搏命做研究，到底圖什麼？」

對於朋友的讚賞和肯定，我當然很感謝。但對他的過譽，則愧不敢當。至於他提出「圖什麼」的問題，我則笑而不語，因為這不是一兩句話可以說得清的。但我內心非常清楚，這是關乎個人興趣和志向的問題。因為我從小受母教影響，立志讀好書，將來可報效國家社會。雖然當年由於「文革」的原因，我初中畢業便被逼輟學。但書不是只能在學校才能讀，學術研究也不是只能在大學或研究所才能做，我相信只要對學術文化有真正的興趣和足夠的毅力，再加上一點天份和自信，就完全可以靠自己的刻苦鑽研取得無愧於時代的學術成果，就能對中國學術文化作出自己的貢獻。當然，我還要特別感謝饒師選堂先生，他生前曾對我說：一個學者將來的歷史定位，是由其學術成就以及對中華傳統文化貢獻的大小所決定的，而與其頭銜職稱的高低無關。饒師在學術上對我多所啟迪，他上述的一番話，更令我受益良多，因為我也靠自學起家，也非科班出身。「請問先生何所自？我本嶺南一布衣。」但這又有什麼關係呢？

因此，我一生致力於學術研究，純粹出於個人的志趣，沒想過值不值和圖什麼的問題。老實說，若做學問只汲汲於名利，斤斤計較個人的得失，無利益便無動力，那麼何來學術的真義？何來中國傳統文化的進步？我不是自鳴清高，但幾十年來自己一直都這樣做，默默耕耘，踐行初志，鍥而不捨地讀書做學問，不斷對前人在國史中一些重要學術問題存在的謬誤和偏見作出廓清和修正，不斷參與對學術前沿的探討並貢獻自己的一得之見，而我的研究也獲得海內外學術界有識之士的重視和肯定。事實證明，我並非徒託空言。

至於個人在學術研究方面的成果，說起來很慚愧，其實也不多，只不過先後出版了區區十多部學術著作。不過，令我聊感自慰的是，這些著作居然在海內外學術界還有些影響，頗蒙學者看重，還為許多國內外的著名大學圖書館所購藏，以供學者研究參考之用。拙文也屢刊於國內著名學術刊物上，香港大公報《藝林》過去也經常刊載我的文章。而拙撰有關「清華簡」的多篇研究論文和其他文章也一再在光明日報《國學版》上刊登，清華大學網站還曾予以轉載。北京大學「燕園禮學」也多次發表我的學術文章。大概因為上述的原因，因此國內外相關領域的人知道我的比較多。

在學術活動方面，多年來，我也經常應邀參加香港和國內許多著名大學舉行的學術研討會。記得2018年春夏之交，我還先後應邀在北京大學禮學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北京師範大學古籍與傳統文化研究院等學府作專題學術講座。演講的論文都收進拙著《禮學與歷史研究》一書中。

2025年6月28至29日，我應邀赴天津南開大學參加由中華孔子學會經學研究專業委員會、南開大學哲學院、清華大學中國經學研究院等機構主辦的第十一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大會邀請了國內外數十所大學一百多位教授和專家學者參加，可謂名家雲集，盛況空前。

此次研討會的主辦人之一、中華孔子學會經學研究專業委員會會長、清華大學中國經學研究院院長陳壁生教授，是近年努力推動我國經學研究發展的新一代領軍人物。他也是潮汕人，多年前，我們因共同參加北京大學禮學研究中心與北大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聯合主辦的一次國際學術研討會而結識。當年，他對《孝經學史》的研究成果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次天津盛會，承蒙主辦機構寄來邀請函，尤其壁生教授出面邀約，自當大力支持。於是用了數月的時間，用心寫好參會論文，並冒着酷暑如期飛赴天津南開大學參加學術會議。

我此次參會的論文題目是：《郭店楚簡〈太一生水〉新證及作者考索——兼論先秦水患的相關問題與「水」的哲學》。我寫這篇論文的緣由，是因為自20世紀90年代《太一生水》篇在楚地出土以來，雖經海內外大量著名學者解詁釋讀和考索，但內容主旨是什麼和作者是誰的問題卻一直未能徹底解決，遂引起我撰文參與討論的極大興趣。拙文的基本內容，是在過去眾多學者釋讀的基礎上作了若干補充，並對《太一生水》篇的內容主旨作了新的論證；同時在對戰國中晚期相關人物史事和文獻典籍進行深入研究和相參互證的基礎上，獲得具體對應的確切證據，最終考出郭店楚簡《太一生水》篇的作者，是早年作為秦相呂不韋門客並佐其編撰《呂氏春秋》一書的青年學者李斯。

承蒙大會安排我第一個作學術報告，拙文引起與會專家學者的重視。作為大會主持人的著名學者、同濟大學曾亦教授特別指出：郭店楚簡《太

一生水》自出土以來，經無數專家學者研究考索了幾十年，但一些重要學術問題至今尚未解決，且一直不知其作者是誰。現在郭偉川老師對《太一生水》篇的內容主旨作了新證，並考出其作者是青年時期的學者李斯，這是郭老師的一項貢獻。

尤其令我感到高興的是，餐敘期間，見到多位久未見面的學術界老朋友，同時還結識了不少學壇新進，舊雨新知歡聚一堂，令人快何如之！而使我頗感意外的是，還有不少中青年學者，其中包括教授、副教授、講師等高校專才，也前來致意問候，並說讀過我寫的多本著作，同時表示他們的敬重之意，令我十分感動。說句內心話，我多年來的夙願，就是寫有益於中華學術的書，願天下英才得而讀之，大家共同弘揚我國優秀的傳統文化。所以，他們的話實在令我十分欣慰，感到幾十年來在國學研究之路上的任何艱辛都是值得的！

所以，誠如上述，多年來我確實忙於國學研究和歷史考證，但對鄉邦文化仍然不敢或忘。尤其對地方史志中長期存在的疑難問題，我也緊記於心，努力予以解決。於是連年續有新作，同時還對若干舊作進行補充整理。既已集腋成裘，自當結集成書。考慮到本書內容的特點，以及從潮汕歷史研究追本溯源的角度，我決定以《嶺東門戶：從古揭陽到近代潮汕》作為書名。蓋近代的潮汕，正是從秦漢時期的古揭陽經過兩千多年的歷史沿革而來的。

大凡對地方區域史及其人文的研究，都必定力求探索其源頭，包括研究其前史，這就涉及歷史地理學與民族學的相關問題。饒師宗頤先生當年總纂民國《潮州志》，其中就包括《地理志》與《民族志》，顯然就出於這方面的考慮。而潮汕土著民族究屬何少數民族？這一問題至今眾說紛紜，尚未徹底解決。於是，我經過長期的研究考索，特撰《粵東土著畬族的源流及其與中原文化的關係——兼述從秦至唐代之後潮州鳳凰山畬族的歷史變遷》一文，以冀較為客觀地考述本地古代的土著民族問題，並作為潮汕地方史研究的史前部分。

至於潮汕地區歷史的開端，一般認為乃肇始於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對嶺南的統一戰爭。如所周知，秦每滅一國必設郡置縣，所以佔據嶺

南後，很快就建立南海郡。根據《漢書·地理志》的記載，秦置南海郡領縣六，如下：

南海郡秦置，縣六：番禺、博羅、中宿、龍川、四會、揭陽。

不過，上述六縣中，置縣的時間其實有先後。因為番禺、博羅、中宿和龍川四縣在秦軍進入嶺南不久，即已與南海郡同時建置，因此，軍書能及時馳報，朝廷得以記錄存檔。而四會與揭陽兩縣於秦末建置，而其時正值陳勝、吳廣揭杆起義，項羽、劉邦逐鹿中原，天下大亂之際，嶺南與京師訊息不通，因此朝廷未及備載。及至西漢，司馬遷根據秦檔及其他史料撰寫相關史事，故後世讀《史記》，在有關秦平嶺南建立南海郡所置縣份的問題上，就只知有番禺、博羅、中宿、龍川四縣，而對稍後建置的四會與揭陽兩縣，未有述及。這些客觀的歷史事實，顯然也是造成四會、揭陽後於上述四縣的歷史原因。

但是，客觀而言，自古至今，嶺南在自然地理上分為粵中、粵北、粵西和粵東四大區域。秦既然在粵中和粵北已設置番禺、博羅、中宿和龍川四縣，那麼於時機成熟時分別在粵西置四會縣和在粵東置揭陽縣，是必然的。只是因各自的歷史原因，置縣的時間比前述四縣稍晚而已。有關這一問題，我將在拙撰《秦代揭嶺的地理範圍與揭陽縣的初置》一文中有較詳細的考析。

秦在統一嶺南的過程中，有關移民的問題，首先是秦始皇三十三及三十四年（前 213）連續兩次下詔，命令徵召大量被囚禁的故六國反對者及其家屬以及一般罪犯充作伏役，同時動員大量民伋充當後勤人員，運送糧餉，支援平定嶺南的軍事行動。³ 實際上，這數以十萬計的北方民眾便成為當年進入嶺南的第一批移民。

另一方面，秦末中原爆發大規模戰爭動亂，當局無從對嶺南繼續提供糧餉供應，所以數十萬軍隊的衣食便成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嶺南的秦軍一部分要實行屯田自給，一部分要轉業到地方，其中就包括秦郡監史祿，也即《史記·主父偃傳》中所稱之「監祿」。他曾領導鑿通靈渠，負責糧餉

供需，據該文記載：「尉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鑿渠運糧。」⁴ 足以為證。

其時由於北方大亂，糧餉供輸斷絕，於是史祿帶領後勤部隊的士兵到粵東平原地區屯田，一方面與土著部落軍隊作戰，一方面生產自給，並為作戰部隊提供糧食。其時史祿被委派至粵東擔任地方軍政長官「揭嶺長」，此事明代學者歐大任在《百越先賢志》中有相關記述。⁵ 期間並在揭西河婆一帶建立「揭陽戍」作為臨時行署和軍事指揮機構，明嘉靖郭春震《潮州府志》有「秦揭陽戍」的相關記載作佐證。毫無疑問，臨時設立「揭嶺長」和「揭陽戍」只是稍後建置揭陽縣的過渡階段。至於史祿帶領其家屬及部眾移民粵東揭嶺之事，清代學者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一書中，有如下進一步的記載：

史祿轉餉，留家揭嶺，此為中土移民入潮之始。⁶

於是粵東地區在史祿的領導下，秦軍轉業落籍地方和來此墾殖的移民日多。至秦末，人數益眾，於是「揭陽戍」具備升格為揭陽縣的條件已趨成熟，而揭西河婆因為是「揭陽戍」的所在地，便成為早期的揭陽縣治。

綜上所述，秦在嶺南的粵中、粵北建置了番禺、博羅、中宿和龍川四縣之後，接着又在粵西和粵東分別建置四會、揭陽兩縣，所以班固才會在《漢書·地理志》中載明秦置南海郡，統番禺、博羅、中宿、龍川、四會、揭陽六縣。

及至秦二世胡亥三年（前 207）前後，北方戰亂即將禍及嶺南，南海尉任囂於病危之際，囑龍川令趙佗「絕新道自守」。⁷ 其後趙佗遵其遺囑擊併桂林、象郡，初時成立南武國，自稱「南武王」⁸，至漢高祖劉邦派陸賈南來招撫時，才改封「南越王」，於是才有南越國。

我認為趙佗對嶺南史有無可倫比的貢獻，而且惠及治下的揭陽縣人民。所以在「秦及南越國時期」的部分，我特別寫了《趙佗在嶺南的立國及其與各民族的和睦相處——兼論秦漢時期粵東移民與古揭陽方言的逐漸形成》一文，我認為這方面的考索有歷史事實和語言學的研究作為依據，

也符合歷史邏輯。

就史實而言，歷史上與古揭陽相關的重要人物，載於國史者，有任職「揭嶺長」並留家揭嶺的史祿，其後就是南越國和西漢時期的揭陽令史定。《史記·南海尉佗列傳》記述漢武帝元鼎五年（前112）統一嶺南之際，「聞漢兵至及越，揭陽令定自定屬漢」⁹的事。及至元鼎六年（前111），漢武帝因史定在嶺南統一戰爭中立下殊功而封其為安道侯、世襲揭陽令，此事《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也有清楚記述。及後漢武帝賜史定以邑為氏，姓「揭陽」，因此東漢班固在《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中才明确稱其為「揭陽定」。客觀而言，史定任南越國和西漢兩朝的揭陽縣令數十年，對古揭陽有巨大的歷史貢獻，對潮汕史有極其深遠的影響。所以，我在本書特闢「漢揭陽令史定專題研究」專輯，內收《〈揭氏族譜〉與國史和潮汕地方史的互證》一文；另外，專輯中還加入我近年就《史揭合序》中說史定「險據國中之喉吭，業二十餘載矣。……史定以素教聚蓄儲者，挈地歸漢」的記載，結合廣東五華獅雄山出土漢代城址發掘出「定揭之印」等考古資料進行互證的新成果，使讀者能夠對潮汕史上這位至關重要的歷史人物有更深入的了解。

有關兩漢治下粵東地區地方建制的問題，我發現除西漢末年新莽篡政極短暫地以「南海亭」為名之外，不久光武中興，東漢皇朝在粵東恢復「揭陽」建制名稱。其後進入三國時代，嶺南地區屬孫吳所有，粵東仍沿襲前朝揭陽縣建制。故從秦漢至三國的近五百年間，「揭陽縣」始終成為這一地區地方建制的象徵和標誌。

及至三國歸晉，粵東在歷史地理上顯然有所改變。因為我在查考《晉書·地理志》南海郡所領六縣時，將其與《漢書·地理志》進行仔細比較，結果發現西晉時期南海郡所領六縣中，有番禺、博羅、龍川、四會四縣與漢代相同，但取消粵西的中宿，在粵中增置增城一縣。至於粵東原本的揭陽縣，竟被改名為「平夷縣」，此中究竟是何原因？令我十分費解。於是窮究史書，找出其中的來龍去脈，並撰成《古揭陽從三國兩晉時期及其後的歷史沿革——兼論西晉時期揭陽縣改名為「平夷縣」的歷史原因》一文加以考述。

西晉的局勢，至晉武帝司馬炎去世後出現劇變，先後發生「八王之亂」及「五胡亂華」而分崩離析。於是晉室東渡，粵東地區便於晉成帝咸和六年（331）將原揭陽一縣之地分拆成海陽、綏安、海寧、潮陽四縣，並改隸於新建置的東官郡；及至晉安帝義熙九年（413），又從東官郡分出上述四縣（即原揭陽縣地）建置義安郡。其後東晉為劉宋取代，開啟了南北朝時代。

在南朝時期，粵東地區於宋、齊、梁、陳諸朝大體以義安郡作為地方建制。及至隋文帝統一中國，於開皇十一年（591）將義安郡改為潮州，領海陽、綏安、海寧、潮陽、義招、程鄉六縣。有關原義安郡改為「州」並用「潮」字冠名稱為「潮州」，我認為不僅因義安郡治海陽「大海在其南」，而且顯然還與其時所領六縣中有潮陽一縣的「潮」字有關，這是客觀的歷史事實。其後唐代（除天寶及至德年間改為潮陽郡外）數百年間大體沿用「潮州」一名，而且延及宋、元、明、清諸朝，相沿弗替，故沿用時間最長，前後有千餘年之久。

就粵東的歷史沿革而言，自隋唐至宋，客觀而言，潮州的轄區是越縮越小。及至南北宋之交，潮州只轄海陽、潮陽兩縣。其後當局出於實際管理的需要，遂決定將海陽縣一分為二，以重置揭陽縣。但過程十分曲折，經過反覆爭議，最後確定析出地處揭嶺之陽的永寧、延德、崇義三鄉重置揭陽縣。於是其時粵東便有海陽、潮陽、揭陽三縣，這也是潮州地區古稱「三陽」的歷史原因。目前，粵東的汕頭、潮州、揭陽三市以及所屬各區縣，其實都是從南宋潮州府的「三陽」先後分拆衍生而來的。所以，按照歷史沿革的實際情況，我們過去之所以自稱為「潮州人」，實際上是指包括「三陽」在內的整個「潮州府」的人。這與現在的潮州市轄下的「潮州人」是有所分別的，因為現在的潮州市的轄區只相當於南宋時期「三陽」中的海陽縣。當然，海陽曾長期作為郡治、州治或府治，政經文化甲於粵東其他諸縣，這也是客觀的歷史事實。

自清末民初汕頭開埠建市之後，汕頭市逐漸在粵東地區勃興，其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已然取代過去潮州府城的地位，在客觀上已成為粵東地區的首善之區。於是人們便取潮州府與汕頭市之首字合稱，這便是近代「潮汕」一名的由來，至今已有百餘年的歷史。只是現在看來，由於「潮

汕」地區不僅指現在的潮州、汕頭兩市，還包括鼎足而三的揭陽市；同時還涵蓋千餘年的重要古縣潮陽，以及明、清兩朝乃至民國時期先後從「三陽」分拆衍生的饒平、惠來、澄海、普寧、豐順、南澳諸縣，還有1991年新置的揭西、揭東兩縣，因此實際上是廣義的「大潮汕」。這一廣大地區，即為宋代潮州的「三陽」，實際上是秦漢時期古揭陽縣的中心區域。為了顧及前後歷史地理發生變化的實際情況，同時也為了避免與宋代重置的揭陽縣相混淆，我遂將秦漢時期最初建置的揭陽縣稱之為「古揭陽」，以示區別。

客觀而言，拙撰《嶺東門戶：從古揭陽到近代潮汕》一書的內容，就其重點與特點而言，主要涉及從秦漢時期的古揭陽到近代潮汕長達兩千多年的歷史，而以歷史沿革為脈絡，以相關歷史人物為中心，以歷史地理為依託，並與嶺南史與國史結合起來加以論述，一切以歷史事實為依歸。在時間跨度上，起自先秦迄至清末民初。在體例上，文章依歷史分期的先後，既有歷史內在的聯繫，又各自獨立成篇，既涉及對潮汕地區兩千多年來所發生的社會演變，又有對域內外相關人物史事的考述，因而基本上尚能體現潮汕歷史的源流及其整體性。

另一方面，我認為無論對國史或地方史的研究，在探索其源流的問題上，事關歷史的大是大非，因此一定要力求弄清其脈絡和真相，糾謬改錯，為潮汕史正本清源，這是大家的共同責任。而在研究和撰寫的過程中，既不能自戕鄉史，也不可毫無根據作失實誇張的杜撰。總之一切務必以歷史事實為依歸。

在這本論集中，我對地方史中一些長期以來存在爭論或至今尚未解決的歷史懸案，也力求根據歷史事實加以研究考析，以冀得出較為正確的結論。

比如北宋末、南宋初分拆海陽三鄉重置揭陽縣，為何相關史籍在置縣的時間上會出現「宣和三年」和「宣和六年」的不同說法？期間如初置揭陽縣治於劉黃村，其後何以又「數年不果立」？此中究竟出於何因？這可說是自宋元之際的《潮州三陽志》以來迄至今日的歷代府、縣志久存的疑案，是八九百年來一直都搞不清楚的問題。為此，我根據國史和地方史的相關記載，反覆考索，撰成《宋代重置揭陽縣一波三折歷史原因考析》一文，

為其辨明來龍去脈。

又如蘇軾本人究竟有否親臨潮州，與誰同來？其《過陰那山》一詩並序究竟是否「偽作」？這也是潮汕地區自古至今長期爭論不休的問題。此次我也痛下功夫，在《蘇東坡全集》中找到確切的證據，證明蘇軾在其潮州好友吳子野（按：即吳復古）的陪同下，親臨潮州韓山拜謁韓文公廟，期間且親至潮陽。凡此種種，我在所撰的《蘇軾仕途起落及其與潮州的歷史淵源——兼述蘇氏與潮州高士吳子野死生契闊的交誼》一文中，作了較為深入和細緻的考析，希望有助於解決地方史久存之疑案，並為國史上的蘇東坡研究，增加一些切實有用的新內容和新觀點。

另一方面，地方史對有關宋元之際揭陽縣建城的論述也存在不少錯誤。比如宋代重置揭陽縣後是否有建城池的問題，過去多依從清順治吳穎《潮州府志》以下各朝府志舊說，認為宋無建城，至元末始建，連民國《潮州志》也沿襲其說，且一直影響至今。然而，經我深入考證國史和地方史的相關問題，認為上述說法不符合歷史事實，所以特撰《揭陽縣於宋元兩朝先後建城相關史事考析》一文，證明南宋初置揭陽縣時已建有子城，同時文中對元代建城的歷史大環境及其前因後果，進行較為詳細的歷史考析。至於明代揭陽縣城池的興廢修築的情況，過去地方史上說不清楚，此次我也撰文加以澄清。

再如明季潮州忠烈郭之奇在明清易代之際追隨南明永曆帝堅持抗清鬥爭十餘年，官至禮、兵二部尚書加太子太保，並晉武英殿大學士，具宰相銜。他最後被俘不屈，英勇就義，其事跡可歌可泣，連清廷都欽敬其對明朝盡節盡忠，故賜諡「忠節」，史有載籍。但像郭之奇這樣的一代英烈，在王夫之所撰寫的《永曆實錄》中，卻誣蔑其「降清」。我師饒宗頤先生在《郭之奇年譜》中曾為之辨誣。但多年來，王夫之的曲說仍流傳甚廣，不少人仍誤信其言。為此，我大量考索南明史資料及相關典籍文獻，撰成《明代鄉賢郭之奇的抗清事跡與歷史評價——兼考王夫之詆毀郭之奇的來龍去脈》一文，以廓清歷史真相，徹底解決這一問題。

另外，我在研究南明史的過程中，發現王夫之不僅在《永曆實錄》中誣蔑潮州先賢郭之奇等大臣，而且還勾結同樣在永曆朝受到打擊的楚黨「五

虎之一」的金堡，在各自的著作中篡改永曆帝的御諱加以詆毀，以泄私忿。這是南明史一直沒有解決的歷史公案。為此，我經過再三爬梳考索，特撰《王夫之與金堡合謀詆毀永曆帝以泄私忿——《永曆實錄》與《劫灰錄》篡改永曆帝御諱考證》一文，附錄於論集中，與前文貫串而觀，使王夫之、金堡之流詆毀永曆帝和郭之奇君臣的失德敗行，得以公諸於世，從而解決了明清易代之際懸疑至今的歷史積案。

至於論集中其他文章容或尚有可道之處，因篇幅關係，不再一一贅述。回顧過去數十年，我之所以致力於國學與地方區域史的研究，緣於少時受家慈啟蒙立下初志，壯歲又得饒師選堂先生啟迪，且天性酷好文學經籍與歷史考證，興趣與動力發自內心，一切出於自願自覺，故能鏗而不捨，不畏艱辛，不計名利得失，在學術之路上秉志前行。惟歲月不居，漸近遲暮。所幸天公祐我，身體粗安，思路常新，對學術研究興趣尚濃。於是筆耕不輟，樂而忘倦，不知老之將至，只祈願能為國學、鄉史多出一分力，多作一點貢獻。能有今日，我內心充滿感恩！

長期以來，在學術研究的範疇，我雖用較多的時間致力於國學研究與歷史考證，但作為潮汕人，我對鄉邦文化仍長繫於心，所以對地方人文歷史的研究，也盡力以赴，相關撰作沒有間斷。繼《嶺南古史與潮汕歷史文化》一書之後，拙撰《嶺東門戶：從古揭陽到近代潮汕》一書的出版，也是我飲水思源，對家鄉歷史文化略盡綿薄的又一小小奉獻。至於書中所覽不周及訛奪錯漏之處，知所難免，尚祈各位專家學者，不吝指正。

此次拙書承蒙中華書局（香港）出版印行，責任編輯黃嗣朝先生認真負責，精心編校，謹此致以衷心謝忱！

2025 年 11 月 9 日
郭偉川序於港寓

註釋：

- 1 唐代詩人李商隱《登樂遊原》詩：「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 2 《淮南子·人間訓》。
- 3 《史記·秦始皇紀》。
- 4 《史記·主父偃傳》。
- 5 [明] 歐大任《百越先賢志》。
- 6 [清]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
- 7 《史記·南越傳》。
- 8 郭偉川《古番禺、南武城及南武國研究》，載郭偉川著《嶺南古史與潮汕歷史文化》，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2 年出版。
- 9 《史記·南海尉佗列傳》。

目 錄

自 序 i

先秦時期

粵東土著畚族的源流及其與中原文化的關係
——兼述從秦至唐代之後潮州鳳凰山畚族的歷史變遷 1

秦及南越國時期

秦平百越的年代與駐軍揭嶺的歷史考證
——兼論「揭嶺」原為「揭嶺」的相關問題 28

揭嶺的地理範圍與揭陽縣的初置 43

趙佗在嶺南的立國及其與各民族的和睦相處
——兼論秦漢時期粵東移民與古揭陽方言的逐漸形成 55

漢「南海王國」並不在古揭陽縣地
——「南海王國」的來龍去脈及最終結局考析 69

漢揭陽令史定專題研究

《揭氏族譜》與國史和潮汕地方史的互證
——兼論《史揭合序》對考證揭陽令史定的文獻價值 80

揭陽令史定與廣東五華獅雄山漢代城址的歷史關係
——兼與《史揭合序》中史定「險據國中之喉吭」相印證 116

三國兩晉等時期

古揭陽於三國兩晉時期及其後的歷史沿革
——兼論西晉時期揭陽縣改名「平夷縣」的歷史原因 140

唐朝時期

初唐中央政府對潮州地區的綏靖與治理
——潮州鳳凰山畚民唐代大遷徙的歷史考析 156

從韓愈刺潮前後所作詩文觀其心路歷程
——兼論韓氏涉潮詩文對後世的消極影響 165

宋元時期

蘇軾仕途起落及其與潮州的歷史淵源
——兼述蘇氏與潮州高士吳子野死生契闊的交誼 181

宋代重置揭陽縣一波三折歷史原因考析 228

揭陽縣於宋元兩朝先後建城相關史事考析 254

明清時期

明朝天順年間粵東寇患及平亂始末 275

略述明代揭陽縣城池的興廢修建 286

明代鄉賢郭之奇的抗清事跡與歷史評價
——兼考王夫之詆譏郭之奇的來龍去脈 295

王夫之與金堡合謀詆譏永曆帝君臣以泄私忿
——《永曆實錄》及《劫灰錄》纂改永曆帝御諱考證 325

明末清初閩鄭軍閩集團禍亂粵東始末	
——以九軍勾結鄭家軍先後在揭陽屠城屠鄉為重點	335
海內外潮汕人鼎力支持孫中山反清革命	
——兼論丁未黃岡起義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影響	366
清末民初汕頭的開埠建市及其在粵東的勃興	
——近代潮汕僑批業的發展是汕頭崛起的歷史見證	383
附 錄	
郭偉川著作名錄	399

先秦時期

粵東土著畬族的源流及其與 中原文化的關係

——兼述從秦至唐代之後潮州鳳凰山畬族的歷史變遷

有關潮汕地區的歷史沿革，在過去的府、縣志中，間也涉及先秦時期粵東史地與民族學的相關問題，我師饒宗頤先生總纂的民國《潮州志》即如是。至於本地區土著民族究屬哪一少數民族？晚近地方史的一些作者大體有畬族、古越族、俚族諸說，迄未有定論。有鑒於此，我經過長期的研究，反覆考索，特撰此文，將粵東閩南的歷史地理與本地區民族學上的相關問題，結合典籍文獻與考古資料加以論述，以冀對粵東土著民族的問題得出較為明確的結論，並作為本書對潮汕歷史研究的史前部分。

潮汕地區位於粵東，屬亞熱帶，氣候溫潤，四季如春。境內有山有水，風景秀麗。就自然地理而言，粵東地勢北高南低，漸次由高山、丘陵、溪河、平原而瀕臨南海，所以陸有稻穀桑麻，海有魚鹽之利，自古以來就是一個適宜人類居住的好地方。因此，先民在這裏居住，必定「安土重遷」，若非事關族群的生死存亡，是不會隨便遷徙的。由於有如此優越的氣候條件和地理環境，所以居住在這裏的先民必定是一個古老的南方土著民族。